

“中介化童年”:学龄期儿童电话手表的数字社交实践研究

■ 邹禧乾 殷 玮

(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4;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广州 510631)

【摘要】本文基于中介化理论,以四川省M市某托管机构23名7—12岁学龄期儿童为样本,采用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方法,探究了电话手表作为具身性媒介技术对儿童数字社交实践的结构性影响。研究发现,电话手表为儿童搭建了虚实交织的社交空间,儿童基于强弱关系动态平衡拓展其社交网络,形成了主动与被动交往的行为互构模式。电话手表的多模态交互推动儿童社交认知契合,使儿童能够开展基于情感补偿的同伴关系维系实践,数字趣味共享的社交参与进一步深化了儿童的群体认同感。然而,技术品牌催生出儿童数字符号分层的社会区隔,持续性的虚拟社交压力使儿童产生了消极数字实践反应,儿童在个性化展演过程中亦伴随着过度社交数据比较的困境。本研究通过剖析电话手表中介化作用下新型儿童社交范式及其影响,丰富了既有研究对数智时代儿童媒介化生存的理解,拓展了儿童数字社会化研究的阐释路径。

【关键词】儿童 电话手表 社交交往 中介化理论 儿童社会化

一、问题提出

数字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深刻重构儿童群体的社会交往实践。2024年11月,共青团中央发布的《第6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2024)》显示,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97.3%,其中近半数未成年网民通过智能手表进行日常社交联结^[1]。以电话手表为代表的儿童具身性数字媒介的普及,使得儿童拥有并掌握了更多的社交自主权。基于电话手

收稿日期:2025-01-05

作者简介:邹禧乾,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媒介心理学;

殷 玮,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媒介社会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移动交友应用对成年早期随意性关系的影响机制研究”(课题编号:20YJCZH010)、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文科专项经费项目“文创数字化对公众参与文化传承行为的影响机制与实践路径研究”(课题编号:2024THZWWH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表的即时通信、语音社交以及“碰一碰交友”等技术功能模块,儿童能够利用电话手表构建自身人际关系网络并进行情感维系。因此,考察儿童基于电话手表开展的数字社交实践,有助于揭示数字化社交对童年社会化的塑造过程,从而引导儿童在数字时代健康成长。

既往研究主要从儿童电话手表使用的“赋权”与“规训”两大视角展开讨论。一方面,儿童电话手表的运动PK排行榜、虚拟徽章等游戏化设计与个性化外观(例如,联名款表带、主题皮肤)赋予了儿童进行数字同伴交往的能动性,拓展了儿童基于数字互动的社会联结网络^[2]。另一方面,电话手表的数字封闭特性、地理定位和通讯录好友审核等机制,又将儿童社交行为框定在家长可视化的监管网格之中^[3]。由此可见,现有研究仍囿于电话手表对儿童社交实践影响的二元框架之内,未能从更为开阔的具身媒介技术“间性”视角,来考察儿童日常化数字交往实践与媒介技术逻辑的动态互构关系。

因此,为突破传统儿童数字媒介社交实践研究的二元框架限制,需要将儿童社交过程与媒介技术之间的关系置于动态互构的研究视野之中。中介化理论(mediation theory)指出,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主动参与社会关系建构、文化意义协商和权力秩序重塑的关键力量^[4]。当作为具身性媒介技术的电话手表深度嵌入儿童日常社交之际,其场景化、跨界化的媒介实践如何改变儿童开展同伴交往的基础结构?通过哪些中介化机制重塑了儿童构建同伴社交关系的过程?又对儿童产生了何种社会化影响?为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通过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方法,以四川省M市某课后托管机构的23名7-12岁学龄期儿童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电话手表对儿童开展数字社交实践的结构化影响,以期拓展数字媒介实践的儿童维度,深化对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儿童独特社交规律的理解。

二、文献综述

(一)儿童社交实践的数字媒介转向

数字媒介技术的普及正在深度重构儿童的社会化进程,形成了具有技术嵌入特征的数字化童年(digital childhood)生态^[5]。既往研究主要聚焦数字媒介使用对儿童身心发展的“双刃剑”效应:一方面,研究发现,儿童新媒体使用时间与其亲社会行为的减少具有显著相关性^[6];儿童玩电子游戏和观看电子节目的频率越高,越容易出现睡眠问题^[7]。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者认为,将儿童数字媒介接触简单视为被动消极的过程具有片面性,主张将研究重点转向数字媒介使用对儿童的积极影响。例如,研究发现,儿童对手机、平板电脑等数字媒介的主动使用,能够促进其执行能力发展^[8],利用社交媒体进行短视频创作则能够激发儿童探索世界的主动性^[9]。然而,上述研究取向局限于儿童数字媒介使用影响的二元对立视野之内,遮蔽了儿童在数字实践中展现的创造性协商能力及其构建自主世界与关系网络的能动性^[10],因而难以捕捉儿童开展“以数字技术为媒”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性规律,这促使儿童媒介使用的效果研究向数字实践研究进行转型。

实际上,儿童并非单向、被动地接受技术规训,而是通过参与数字媒介空间中的流动性社交实践,主动建构身份认同与关系网络^[11]。具体而言,儿童进行社会交往的数字媒介实践存在虚实场景互嵌性、代际权力关系协商性以及情感补偿的媒介依赖性这三重特征。首先,虚实场景互嵌性

构成儿童数字媒介实践的基础架构。例如,儿童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音视频作品,远程参与同伴互动交流以获取同辈认可^[12],儿童同样能够在虚拟社区中通过参与社区谈论和社会实践学习,建立社交联系并提升社区地位^[13],这类数字媒介实践模糊了儿童进行线下和线上学习、娱乐与社交的行为边界。其次,代际关系协商性凸显儿童数字媒介使用过程中家庭内部的权力博弈场景。家长通过智能设备监控以及数字化陪伴等“数字化育儿”(digital parenting)技术对儿童实施亲职管理^[14],其“安全守护”的话语体系与儿童数字媒介使用过程中的“父母调节”(parental mediation)策略^[15]形成规训儿童数字媒介行为的结构化力量,而儿童在此过程中通过多账户切换、信息选择性披露以及诉求数字媒介使用以融入同辈群体等策略,以争夺数字媒介实践的自主权^[16]。最后,情感补偿揭示了儿童数字媒介依赖行为背后的深层心理动因。例如,父母外出务工导致留守儿童需要借助视频通话维系亲子情感纽带^[17],儿童往往能够通过虚拟宠物汲取陪伴感以缓解孤独^[18],这表明数字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弥补儿童现实情感缺位的“补偿装置”。

上述研究主要围绕儿童数字媒介使用的影响效应及其线性作用机制展开探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儿童开展数字媒介实践的若干特征规律,但仍存在两个关键研究缝隙:一是对数字媒介情境下儿童同伴互动的日常化实践研究不足,特别是未能深入阐释儿童如何通过数字媒介技术实践建构其同伴关系网络的过程。二是未能充分关注以电话手表为代表的具身性媒介技术嵌入儿童日常社交行为之后,所引发的儿童数字实践基本架构与机制变化及其社会化影响。

(二)电话手表对儿童社交行为的重塑:中介化理论视角

电话手表作为儿童具身性媒介,其设计逻辑与社会功能深刻影响着儿童同伴交往行为及规则。本研究通过引入中介化理论来分析电话手表对儿童开展日常同伴交往行为的重构作用。中介化理论为理解媒介社会的日常生活与文化动态提供了阐释框架,主张人类的传播交往与社会互动需通过传播技术的中介过程实现,并进一步揭示了媒介技术通过其中介化角色对人类互动、文化实践及社会结构产生的系统性影响^[19]。潘忠党进一步指出,中介化具有技术性、空间性与社会性三重特征:媒介技术革新重塑了个体时空认知,媒介从信息工具演变为世界互动框架,影响着个体思维与行为。媒介技术扩展了个体社交网络以及互动机制;媒介技术的进步同时也催生了多样化的社会交往形态,既促进了社会联系又形塑了交往界限^[20]。上述分析框架为理解电话手表对儿童社交行为的重塑过程提供了具体指南。

首先,在儿童电话手表的技术性层面,电话手表的技术功能与儿童日常社交行为具有适配性。电话手表的定位功能、语音通话、即时消息以及紧急呼叫等技术设计,不仅满足了家长对儿童安全的监护需求,同时也为儿童开展自主社交提供了技术支持。已有研究表明,儿童借助电话手表强化了虚实融合的社交实践,并与儿童本身形成了紧密的互构关系,从而塑造了儿童特定的社交互动范式^[21]。例如,电话手表的即时线上交流功能,使儿童能够自由表达情感,增强了同伴间的相互认同^[22]。此外,电话手表的“可穿戴性”使其成为儿童自然化的身体延伸,儿童围绕电话手表开展的社交行为得以内嵌于儿童日常化生活场景^[23],这与智能手机离散式社交体验形成了明显区别。其次,在儿童电话手表的空间性层面,电话手表的地理定位与即时通信功能打破了物理空间限制,使儿童社交行为从物理空间的“在场共处”转向线上线下交往的“虚实融合”。一方面,由于父母能够通过电话手表实时定位以及软件禁用等手段,使儿童的物理活

动范围(如小区、街道)以及虚拟线上行为成为家长可监控的“安全区”,这窄化了儿童开展社交行为的“虚实边界”^[24]。另一方面,电话手表又强化了儿童在物理空间受限的情况下维持虚拟社交连接^[25]。例如,儿童在放学后即使不能见面,仍可通过电话手表进行语音聊天,延续课间未完成的游戏或话题,这种空间中介化使得儿童的社交互动不再受制于物理临近性,而是呈现出“流动性社交”(liquid sociability)特征。最后,在儿童电话手表的社会性层面,既有研究主要采用“自上而下”的监护范式,着重探讨家长如何通过定位追踪、通讯限制等功能实现家庭监护的便捷化与合理化^[26],然而儿童电话手表作为微型社交平台亦具有建构儿童同伴文化的功能。例如,儿童使用电话手表内置的社交软件保持与同伴交流的“微屏社交”,能够通过小圈层互动强化儿童间情感联结^[27]。但不同品牌电话手表使用的圈层化特征,亦加剧了儿童同伴交往内部的社交等级化、设备品牌差异化催生的品牌竞争与社交区隔行为^[28]。

综上所述,作为数字化童年建构的新型具身性媒介技术,儿童电话手表已成为洞察当代儿童社会化进程的重要载体。本研究尝试运用中介化理论框架来解析电话手表对儿童社交实践的重构过程,旨在揭示在儿童技术具身化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儿童主体性实践与媒介技术逻辑之间的动态互构关系及其社会意涵。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本研究以四川省M市某课后托管机构为田野地点,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参与式观察(2024年11月至12月)。在参与式观察过程中,研究者选取了23名7-12岁的学龄期儿童作为深度访谈对象。表1呈现了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表2呈现了本研究的访谈提纲。

(一)田野点调查选择

本研究所选取的课后托管机构坐落于四川省M市居民聚居区,毗邻多个住户密集型小区,其服务半径覆盖周边教育需求,与两所最近的小学直线距离约为2公里左右。该托管机构主体建筑为双层结构,首层设置接待咨询区与多功能活动休息区,配备益智游戏设施;二层规划为教学空间,包含四间教室及一间教师备课室。该托管机构自运营以来,小学部至高中部学生总量稳定保持在60-70人,其中小学部学生数量稳定在30-40人。该机构学生长期一起进行课后学习,并时常有新同学加入,使得该托管机构的儿童社交圈层兼具稳定性与流动性。此外,在该托管机构内部,儿童电话手表普及率较高。据研究者统计,长期佩戴并使用电话手表的儿童占比约为78%,儿童电话手表使用经历丰富,并且与同学、朋友等同伴群体互动频繁,因此该托管机构是较为理想的田野地点。

(二)研究样本

埃里克森将儿童成长阶段分为婴儿时期(0-2岁以内)、儿童早期(2-4岁)、学前期(4-7岁)、学龄期(7-12岁)和青春期(12-18岁)五个阶段^[29]。根据发展心理学对儿童年龄阶段特征的研究,学龄期儿童正处于借助具体事物或形象进行分类和理解逻辑关系的阶段,社会性发展需求显著增强^[30],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交往意愿,倾向于通过集体活动构建稳定的社交网络。因此,本研究将访谈对象界定为7-12岁的学龄期儿童。在本研究中,15名儿童使用“小天才”

电话手表。7名儿童使用“华为”电话手表。1名儿童使用“米兔”电话手表。

学龄期儿童属于未成年人范畴,本研究将其作为研究对象严格遵循了科学研究伦理准则,以确保研究计划与实施程序的伦理规范性。第一,在研究计划实施前,研究者所在科研单位的学术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核并批准了本研究伦理申请。第二,研究者获得了该托管机构负责人许可,并告知对方研究计划、研究目的以及研究对象等关键信息。在对儿童进行访谈的过程中,研究者征得了访谈儿童本人及家长的同意,在儿童受访者及其家长知情的前提下进行访谈录音,后续转为文字稿逐句分析,并对受访者身份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表1 访谈提纲

基础信息与使用习惯	社交功能与互动行为
你几岁呀?读几年级呀?	你现在喜欢电话手表的哪些功能呀?有哪些功能是你不喜欢的呢?为什么呀?
请问小朋友,你的电话手表是父母主动购买还是你自己要求的呀?为什么要购买呢?	你会不会使用电话手表和不熟悉的小朋友成为好友呀?为什么呢?
你使用电话手表多久啦?平时使用电话手表的时间多吗?一般在什么时间使用电话手表呀?	你会使用电话手表联系同学和朋友吗?平时和哪些人联系比较多呀?
和你经常在一起玩的小伙伴使用电话手表吗?老师同意你们在学校里使用电话手表吗?	你一般在电话手表上和你的同学、朋友们聊什么内容呀?可以详细说说吗?
你一般用电话手表来做什么呢?可以详细说说吗?	你会使用电话手表群聊和朋友们联系吗?你更喜欢群聊还是私聊啊?为什么呀?
你的电话手表加了哪些好友呀?除了学校里的同学,还加了哪些人呀?	你会使用好友圈的功能吗?如果会的话,你一般在好友圈发什么消息呀?

四、研究发现

(一)儿童电话手表数字社交实践的基础架构

电话手表作为儿童具身性媒介,通过时空融合、关系转化与行为互构三个维度,构建起儿童数字社交实践的基础性架构。在时空融合层面,电话手表将线下初级群体关系延伸至线上,创造了虚实交织的流动社交空间;在关系转化层面,电话手表的数字社交生态使得儿童强弱关系具有动态转化的潜能;在行为模式层面,电话手表数字实践推动儿童社交角色的动态调整,形成儿童主动与被动交往行为互构的循环机制。

1. 儿童线上线下交往关系的时空融合

基于儿童电话手表的可穿戴性,儿童的社会交往实践得以超越线下时空限制,实现了线上线下交往实践的全天候时空融合。儿童的日常活动范围较为固定单一,其社交圈较为狭窄。因而,儿童线上人际关系网络主要从家庭、学校等传统场域中的人际关系延伸而来,儿童线上社交关系也主要由父母、亲属与同学等初级群体关系构成。在传统社会交往中,初级群体中的成员通过面对面的直接接触建立起深厚的情感基础,但线下关系向线上关系的时空转变使儿童群体成员之间能够实现虚拟“在场”的全天候信息传递,这进一步巩固了儿童同伴群体间关系的密切程度。正如小Z在访谈中提到:“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幼儿园的同学,她现在去xx(隔壁市)读小学了,只有

放假(寒暑假)她才回得来这边。我手表上加了她的好友,我们平时(平时)会在手表上面摆龙门阵(聊天)。”同时,电话手表所创造的流动媒介空间为儿童线上关系向线下关系的转变提供了话题与契机。借助电话手表,儿童围绕游戏、动漫等多元话题进行广泛交流,发现彼此在认知、兴趣和情感表达上的契合点,获得强烈的情感共鸣,进而加深彼此间的社交联系,使儿童能够在线上形成较为紧密的社交关系纽带。当这种因共同话题探讨和情感共鸣所产生的满足感持续累积并达到一定阈值时,儿童内心便会自然而然地萌生出将这种虚拟线上关系拓展至真实线下情境的强烈渴望。例如,小P表示:“除了班上的同学,我还加了外头(外面)舞蹈班的同学。我和她经常在手表上聊天,基本上只有每块(个)星期六晚上跳舞(的)时候才能见到面,就加了电话好友。有一回我和她用手表聊到了贴纸,那回后头(那次后)就发现我们喜欢买一样(的)贴纸,现在我们下课都不慌到(着急)走,还说好星期天一路(约着)去文具店买贴纸呢。”电话手表促成的这种线上线下关系的互动,使得儿童可以自由切换不同的社交场景,这拓宽了他们社交活动的空间范围,使他们在不同场景之间自如穿梭,维系旧友谊并建立新的人际联系。

2. 儿童强弱关系连接类型的动态转化

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将人际关系按照社会交往的紧密性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种类型^[31]。他指出,强关系中人们之间的联系具有强紧密性和情感连接性,而在弱关系中,人们之间的交往与联系具有疏离性^[32]。关于数字媒介时代社交关系转化的相关研究认为,特定情景下紧密的主客体互动、即时反馈,会使得陌生人之间形成一定的亲密关系^[33]。儿童能够在特定社交情景中利用电话手表进行关系扩展,使得偶发性弱关系进一步演变成固定性强关系。在本研究中,部分接受访谈的儿童会把在游乐场、培训班或其他娱乐场所有过一面之缘的同龄人添加为电话手表好友,并进一步发展人际关系。小B披露了与其电话手表好友的相识过程:“她是我在小区里耍滑梯(玩滑梯)那里认到(认识的),跟我住一个单元。我们加了好友之后,就在一起耍(玩)。后来我们就在手表上头(上面)的群里聊天,我们还经常给对方点赞,慢慢(的),我们就变成最好的朋友了。”这表明,儿童利用电话手表的微聊、好友圈点赞与评论等功能展开交流互动,增进亲近感,从而缩短彼此间的心理距离。随着互动频率不断增加,既有弱关系逐步实现向强关系转化。这种关系转化的过程强调了电话手表作为社交工具的桥梁作用,使得原本疏离的个体在频繁的互动中建立起更紧密的交往联系。然而,尽管儿童电话手表对儿童培养同伴认同、信任进行了赋能,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强关系向弱关系的转化。在社会关系中强弱关系转变涉及互动、情感、关系以及互惠等四个层面^[34]。在儿童群体中,同伴是否能及时回复消息、是否能保守秘密等人际互动规则是其对好朋友关系的判定标准,也是儿童社交关系中影响强关系向弱关系转化的重要因素。正如小A所言:“上次我想给我朋友说一个我的秘密,但是在学校里边人太多了,另一个人一直跟着我们玩,然后我们就会回家拿到(拿着)手表摆(聊)。但是她后头(后面)把我给她说的事情告诉其他人了,我现在就再也不想给她秘密了。”

3. 儿童主动与被动交往行为的循环互构

在儿童利用电话手表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其性格、交往意愿等个体特性会影响其互动行为,而交往情景与电话手表的媒介环境亦会反作用于交往行为。电话手表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社交情境,使得儿童表现出主动社交与被动社交两种不同的行为表现。性格开朗的儿童能够快

速主动地与他人建立联系、培养感情,而内向、腼腆的儿童在与同伴交往的过程中则表现得相对被动。这导致了儿童利用电话手表进行社会交往之际,一些儿童会主动添加好友或积极回应好友申请,并在同伴交往中主动挑起话题,成为“话题引领者”;另一部分儿童则倾向于被动接受社交邀请,在同伴交往中保持沉默,扮演“潜水者”的角色。然而,这种交往行为模式具有动态性,被动社交的儿童可能在媒介技术介入之下,经历角色转换,进而展现出更为积极主动的交往姿态。研究者观察到,小Q是新转到托管机构学习的一名四年级女学生,在进入课堂初期,该同学表现得较为沉默与害羞。之后,研究者观察到小Q时常与其他同学互动并讨论自己电话手表里的积分以及其他功能,还会组织同学们一起进行运动PK。小Q在接受访谈时,提到了这一转变经过,她表示:“我刚来这儿的时候一个人都认不到(不认识),也不晓得跟他们聊啥子(什么),他们来找我耍(玩)我才会去跟他们耍(玩)。后来我看到他们下课后围到一起耍(玩)电话手表加好友、比赛跑步那些(之类的),我后头(面)也就把那手表戴到机构来跟他们一起耍老(玩了)。”这一现象表明,不擅长面对面直接互动的儿童,通过虚拟平台获得了更多尝试与表达的机会,由原来同伴交往活动中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积极的组织者、协调者。在角色转换过程中,儿童实现了满足感与信任感的获得与积累,并通过持续的正向反馈机制,形成了主动与被动交往之间的循环互构关系。这种动态循环过程使得儿童的主动交往行为不断被强化和再生产,使他们在同伴交往中展现出更为积极主动的自信姿态。

(二)儿童电话手表数字社交实践的中介化机制

儿童电话手表作为数字化社交的中介载体,通过认知、关系与参与三重机制重构了儿童的互动实践。在认知层面,电话手表的多模态交互方式促进儿童情感表达的精准化与双向反馈的即时性,使儿童达成具身化认知契合。在关系层面,液态关系的流动性通过情感补偿机制帮助儿童实现了对同伴交往关系的主动管理,表情包等拟人化符号弥补了隔空交流情景中的语境缺失;在参与层面,儿童电话手表为儿童搭建了虚实交织的趣味共享平台,深化了儿童交往过程中的群体认同。

1. 认知机制:多模态交互中的儿童认知契合

中介化理论认为,媒介技术本身的形式及特点直接影响了信息构建与接受的方式,其中介作用意味着信息并非单向流动,而是具有互动性与反馈性^[35]。与传统文字或语音交流相比,电话手表的多模态交互界面功能为儿童创造了一个多感官、立体化的交互环境,这能够让儿童更准确地感知对方的情感与态度,尤其是在跨越物理距离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面对面交流中的丰富情感信息,辅助儿童更准确地对同伴传递的信息进行解码与反馈。这种即时且双向的信息传达能使儿童更加准确地解读对方的情绪变化,从而优化自己的反馈策略,进一步促进互动双方对彼此人际行为意图的理解。正如受访对象小Z所言:“我还会打字,我都是给别人发语音,还有打视频电话,这样更简单一些。”这表明,儿童在享受电话手表自主权所带来的信息交互便利与自由的同时,儿童之间的信息传播形式也正被电话手表这一中介工具所重塑和改变。这反映出以电话手表为中介的交流超越了传统的信息传递功能,成为塑造儿童独特数字交流模式的关键部分,这尤其体现在儿童利用电话手表规避家长监控与同伴达成认知“默契”的策略化传播实践过程中。儿童利用电话手表不仅能够与同伴保持密切联系,还能够通过电话

手表的多模态传播功能进行应对父母监控的策略化传播。例如小Q在访谈中提到:“我有时会在写作业的时候偷而磨子嘞(偷偷)跟朋友聊天。为了不被我妈妈抓到我没有认真学习,我就跟我朋友说好了一个暗号。就是只要她看到我给她发一个熊猫的表情包,就不再给我发消息老(了)。因为我们约定好,那个表情包的意思是‘我爸爸妈妈来了,不要再发消息给我了’”。这表明,电话手表使得儿童信息互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父母的管控,从而在信息交流中扮演更加主动和独立的角色,促成以双方认知契合为基础的同伴关系维持。

2. 关系机制:情感补偿与儿童同伴关系维系

研究发现,儿童对扩展社交网络与维持同伴关系的需求较为积极,他们倾向于主动参与其中,享受与同伴之间紧密的情感连接。电话手表这一技术中介不仅为儿童提供了通过多元化手段扩展关系网络的机会,还为儿童与同伴之间隔空情感连接提供了更多的社交线索,使儿童对社交关系的网络拓展与维系变得更加顺畅。例如,儿童可以自行创造表情包这一社交线索,即通过中介化环境中的“情感补偿”机制^[36]进行同伴关系维系。利用表情包这一多模态的交互方式,儿童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变得更加立体化,进而能够基于更为丰富的数字感官线索捕捉和理解对方的情感表达,有效地维护同伴关系与社交网络。儿童在聊天中通常高频率地使用动物表情包或卡通形象来指代自己,这表明儿童沉浸于电话手表这一媒介技术构建的交互场景之中,形成“表情包即我的”表意实践。受访儿童小H说道:“我最好的朋友会给我讲她屋头(家里)的事,有的时候不开心了也会给我说。昨天晚上她给我发了一个‘哭哭’的表情包,我就给她发‘乖,不哭了’这个表情。她平时想她爸爸的时候就会哭,我就问她是不是想爸爸了,她说是勒(的)。然后我安慰她不要难过”。借助表情包,儿童能将情感表现符号化,不再仅仅依赖于文字来描述自己的感受,而是通过表情包来传递细腻的情感层次。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物理空间局限而产生的情感空缺,尤其是在缺乏面对面接触的情况下,表情包为儿童提供了一种具象化的情感输出方式。它们通过模拟面部表情及肢体动作,在电话手表所创造的传播情境中表达出更加准确的情感安慰,让儿童与其同伴之间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对方的喜怒哀乐,从而使得儿童以更为“走心”的方式维系彼此之间的交往关系。

3. 参与机制:儿童数字趣味共享的参与实践

塔吉菲尔(Tajfel)的社会认同理论指出,个体通过参与群体活动,并能够通过群体归属感获取自我价值^[37]。儿童通过参与同伴群体实践活动,获得群体认同感的过程,本质上是儿童在群体互动中实现自我认可的社会化实践。电话手表为儿童实现数字化趣味的社会交往提供了具身化的交互界面以及实时协同的游乐平台。通过手表之间的物理碰撞,儿童的社会化行为被媒介技术编码为可量化、可运算的动态数据,形成映射现实游戏关系的动态数据网络。在托管机构自由活动时段内,儿童利用电话手表所形成的“手表社交圈”,便是儿童群体依托技术中介构建的虚实交织型互动游戏场域。当儿童启动手表社交时,设备碰撞不仅触发技术连接,更成为群体互动仪式的启动信号。例如,在课间休息时段,儿童使用电话手表的行为往往会引发同伴群体的自发聚集,继而展开基于电话手表游戏的小型社交活动:儿童将手表佩戴在手腕上,与对方碰一碰,等待系统连接后便开启了运动PK游戏。通常游戏为原地高抬腿,比赛谁能先实现100步的目标。最终统计结果出来后,输了的儿童会被扣掉1个积分,并且手表上会显示“加油

吧,少年!”“扎心了老铁”等文案与一张表示遗憾的图案,激励儿童继续加油。在此类场景中,围观儿童会自发模仿竞赛者的动作,将算法规则转化为群体共识,衍生出儿童群体内部的“菜鸟还需努力”等个性化表达。这种持续进行的游戏互动形式不断巩固着儿童群体社交关系,儿童自主建构的交互礼仪生动展现了趣味化共享如何催生“意义共同体”,最终实现群体认同的过程。本研究发现,部分儿童在参与或体验电话手表所搭建的趣味化参与实践后,会主动要求甚至反复恳请父母为其购买超出实际需求的电话手表,且品牌选择集中在“小天才”与“华为”。受访者小C直言:“身边朋友都用小天才耍(玩),我也想要”。由此可见,相较于产品功能本身,儿童更关注设备能否满足与同伴进行媒介化游戏互动的实际需求。

(三)电话手表对儿童社交关系建构的影响

电话手表以其特有的技术逻辑与交互机制,对儿童社交关系的建构过程造成了多维影响。首先,电话手表的品牌壁垒与功能差异催生出儿童“数字部落化”现象,技术区隔机制使儿童社交圈层呈现出明显的符号化分层;其次,电话手表无间断的虚拟连接带来了持续性的社交信息压力,儿童在社交信息过载中陷入情感耗竭的倦怠状态;最后,电话手表的互动界面将身份展演异化为数据竞赛,儿童社交实践被量化为可计算的绩效指标。这表明,电话手表在拓展儿童社交自主权的同时,也通过这一具身媒介技术功能规则重塑了其社交互动的结构与内涵。

1. 边界生产:电话手表形塑的象征性区隔机制

电话手表对儿童群体间社交场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布尔迪厄(Bourdieu)所指出的媒介“区隔”特征^[38]:当电话手表突破地理区隔实现交往资本再生产时,技术场域内部却催生出新的符号分层体系。电话手表作为技术化产品的同时,也携带着品牌化的价值符号,不同品牌的技术逻辑、功能设计及排他性机制,在无形中塑造了基于品牌数字部落的象征性区隔。在当今儿童电话手表市场中,“小天才”“华为”和“米兔”等品牌通过功能差异化和独特的交友机制形成了各自的品牌生态系统。以“小天才”为例,其特有的“碰一碰”功能仅允许该产品用户之间互加好友,而“华为”电话手表的“摇一摇”交友功能,同样限定在本品牌用户的圈层之内。这种品牌技术逻辑直接导致了拥有不同品牌电话手表儿童群体间的社交区隔。尽管儿童可以通过添加电话号码等方式实现跨品牌好友关系,但互动方式很受限。例如,“华为”无法和“小天才”实现如视频通话、积分赠送等更深层次的社交功能。这种技术壁垒不仅加深了拥有不同品牌电话手表儿童的交往差异,也对儿童开展正常的同伴交往关系造成了重要影响。正如小D所说:“我们班的群是QQ群,我手表上不能下QQ,所以有的时候群里发生了什么好玩的事情,都是另一个同学第二天告诉我的,他的手表可以下载QQ”。这种身份区隔在微观个体层面也深刻影响着儿童在其同伴圈层中的社会地位获取。这是因为,儿童在社交互动中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与同伴的电话手表进行比较,拥有功能更为先进、外观更为时尚电话手表的儿童,可能在社交中占据更为主动的地位,其自我效能感与社交自信也会相应提升;而佩戴基础款或低配置电话手表的儿童,则可能在社交中面临一定的心理压力,在社交机会的获取与社交关系的拓展上处于相对劣势位置。正如布尔迪厄所揭示的那样,此种技术场域中的象征性区隔机制所衍生的符号斗争行为,不仅生产了社交偏见,更是通过限制跨圈层文化资本交换,再生产出排他性的认知交往结构^[39]。这可能进一步导致儿童过度依赖品牌内部社交圈,最终形成儿童群体交往之间的社交偏见。

2. 永恒在线:儿童虚拟社交的持续性

电话手表的即时通讯特性以及“好友圈”、群组等支持儿童成员之间持续互动的功能模块,为儿童创造出了一个脱离时空限制的流动性社交空间,使得儿童开展持续性虚拟社交成为可能。儿童在使用电话手表进行同伴交往的过程中,部分儿童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抵御持续性数字社交压力的行为反应。虽然电话手表作为新型媒介工具极大地拓展了儿童的社交空间与自主性。例如,儿童可在“好友圈”及社群中持续性发帖或更新动态信息。但频繁的电话手表交流与互动使得儿童置身于信息压力之中,不断扩充的“好友圈”以及持续涌入的社交信息,像潮水一般冲击着儿童的注意力。这种无休止的信息接收,不仅分散了儿童的精力,更让他们在面对海量信息时感到无所适从、疲于应对。久而久之,儿童开始对这种高强度、高频次的持续性虚拟社交采取一系列消极手段,以此来减少信息接收压力。两位儿童受访者披露道:“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给我发消息,有一次我写作业没看手表,写完作业一看她给我发了20多条消息,我没有看,就直接给她说:你咋个(怎么)发这么多,我都看不赢(完)(小C);群里的消息我都不怎么看,因为都是一些没意思嘞(不重要的)消息。他们每天都在群里疯狂发消息,一会儿就几十条了,看都看不过来(小A)”。部分受访儿童在面对信息压力之际,通常采取“表情包敷衍”与“已读不回”等策略,甚至是“不读不回”等信息回避措施。这种应对方式与沟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儿童被表面化、快餐式的数字交流所裹挟的消极现状,使得儿童同伴交往与情感联结缺乏深度与真实感,难以建立稳固情感关系。由此可见,儿童在电话手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频繁无效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其在电话手表交往场景中开展同伴互动时的社交压力,儿童采取的社交信息回避行为,实际上是儿童能动性应对表层信息压力的一种消极数字实践。

3. 个性化展演:儿童社交表演中的数据竞赛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指出,个体在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充斥着自我表现行为,这种自我表现行为除了记录生活外,还是一种与他人建立联系、在他人心中塑造自己形象的过程^[40]。在电话手表构建的数字化场域中,儿童能够通过自设的头像、昵称等符号进行数字自我形象展示,还能将“海绵宝宝”表盘、“库洛米”头像与“可爱小宝贝”昵称等可编辑性符号进行模块化组装,开展围绕电话手表进行人个性化展演实践。儿童在基于不同趣缘或动机组建的群聊互动中,会采取不同的社交形象塑造与管理策略。部分儿童在利用电话手表与父母、家人进行交流互动的过程中,通常构建出听话、懂事以及内向的个人形象,但其在与同伴进行线上互动时,则展示幽默、活泼甚至叛逆的个性,常常采用更加自我、直接的表达方式与形象管理策略。例如,儿童通过电话手表的表达机制突破了传统观念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即在性别展示方面,电话手表形象的性别设定与儿童自身的生理性别并非全然一致。在接受调研的23名儿童中,有2名女童将个人形象设定为男性,1名男童则选择使用女性形象。对此,使用男性形象的一位女童小X表示:“我可以用女生的形象,也可以用男生的形象啊,我用男生的形象,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更呛(像)瑄皮嘞男娃儿(大大咧咧的假小子),不得(是)那种文静的女娃儿(女生)”。然而,儿童个性化的展演行为也为电话手表平台内嵌的社交互动逻辑所“异化”。一方面,电话手表“好友圈”本是为儿童分享生活、展示自我所提供的半公开化场域,这为儿童表演欲的释放与个性化演绎提供了场所,满足了儿童开展个性化数字自我展演的

需要。但另一方面,也正因如此,点赞与评论的数量与内容也会被公开展示到共同“好友圈”之中,儿童逐渐开始将点赞与评论这一可量化的指标作为评价受欢迎程度与友谊质量的重要标准。正如小Q所言:“我发了好友圈,要是我朋友不给我点赞和评论的话,我觉得她不关心我”。除此之外,电话手表中的积分、运动榜单也是儿童社会交往过程中开展数据竞赛的重要内容。例如,研究者发现,小X在“好友圈”发布过以下帖文:“你们有多少积分,我就500多(并配截图)”,其余好友则在帖文下方留言:“我有985个了”“5555555,我只有0个”(“5”为网络用语,表示难过情绪)。为了获得更多积分,儿童会请求电话手表好友给自己送积分,或者在群里抢积分红包。受访者小V表示,为了获得更多的电话手表积分,“我有时候会在好友圈里面问他们还有好多(多少)积分,可不可以送点给我”。这意味着,儿童利用电话手表所进行的身份构建不再仅仅围绕实质性的同伴交往与关系维系,而是被电话手表重构为一场以“可见性数据”为重要目标的数据竞赛。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在中介化理论的基础上,以四川省M市某课后托管机构为调查田野,并对23名使用电话手表的7-12岁学龄期儿童进行了深度访谈,揭示了电话手表这一儿童具身性媒介技术对儿童数字社交实践的深层影响。

首先,电话手表深刻重塑了儿童社交实践的底层逻辑,转变了儿童开展社交实践的基础性架构。传统儿童社交受限于物理空间的“在场性”约束,儿童互动行为的开展需要依托校园、小区公共区域等实体空间,儿童群体的交往时段也被学校课程与课后兴趣班等碎片化时间切割。而电话手表通过持续性联网与具身性佩戴,使儿童社交的物理空间与虚拟场景得以叠合。例如,儿童可以在外出旅游时录制风景视频,同步分享至跨地域的好友群组与好友圈这一半公开化场域之中;抑或在家庭场域内通过文字与语音参与线上社群讨论。电话手表这一数字媒介技术打破了传统社交的线性逻辑,使儿童社交实践发生从传统“间断性在场”向“液态数字化”的转向,这意味着一种无固定形态、可随时接入的儿童流动社交连接模式的出现。此外,儿童电话手表的技术功能与界面设计进一步重塑了儿童的社交表演逻辑。在传统面对面交往中,儿童通过口头表达、肢体语言以及面部表情等方式传递信息,私密情感表达多隐藏于“后台”,而在电话手表使用情境下,儿童通过表情包、动画头像等预制化符号进行自我表达与展演,将传统社交中隐蔽的“后台”情感置入虚拟“前台”,并在“好友圈”中将传统社交中私密的情绪宣泄转化为半公开信息,构建了半公开化的同伴关系网络构型。电话手表的技术中介性不仅扩展了儿童社交的时空维度,更催生了儿童具身性数字媒介交往这一新型社交范式,印证了西尔弗斯通“中介化即日常生活重构”的理论命题^[41]。

其次,儿童电话手表的数字社交实践具有“赋权”与“异化”的辩证性特征。这种辩证性特征在赋权维度首先表现为电话手表即时通信、多模态交互等功能重构了社交互动模式,导致了儿童社交主体性地位的提升。例如,儿童能够通过即时通信功能突破传统亲子互动的单向性,即儿童不再被动等待父母安排,而是能够利用拨打电话、社群聊天等方式主动发起沟通、表达自身

需求。在此过程中,电话手表成为儿童争取家庭话语权的工具;其次,电话手表的技术赋权还体现在儿童突破了表达能力边界,并以语音消息、表情包符号替代文字输出进行社会交往,这消解了儿童认知能力所带来的社交限制,规避文字拼写能力不足的尴尬境地,这种技术适应性进一步赋予了儿童对媒介使用的自主权。电话手表的技术逻辑与儿童的社会化需求相互塑造,既在家庭安全叙事框架内拓展了其行动半径,又使儿童在虚实交织的成长空间中探索着权力关系的动态平衡。然而,儿童电话手表数字社交实践中的行为“异化”反映出“童年消逝”的社会化危机。电话手表催生的成人化交往模式,实质是商业资本操纵的微观映照:儿童通过点赞评论等量化指标追求、积分红包等符号消费实践,将情感维系异化为“虚拟礼物”的交换游戏。这种工具理性导向的社交策略,导致本应纯粹、充满童真的友谊被降格为消费主义驱动的社交资本。这种辩证性实践揭示出数字童年面临的深刻困境:技术赋权带来的儿童社交自由,始终受到商业资本以及成人世界规训权力的深刻影响。

最后,儿童利用电话手表自主开展的数字社交实践受到结构性因素制约,其本质是一种“受限的能动性”。应该承认,在儿童使用电话手表的过程中,儿童并非完全被动接受技术规训,而是通过创造性使用展现出一定程度的能动性:一是同伴社会关系的主动管理与策略性调整。通过电话手表,儿童能够跨平台、跨时空扩展同伴社交网络,推动强弱关系转化及主动与被动社交的循环互构。此外,儿童能够在电话手表多模态交互中实现认知契合、建构个性化自我社交形象,并通过创造社交线索维系与其他同伴之间的情感交往关系。同时,儿童为应对持续性虚拟社会引发的信息压力,也能通过采取“已读不回等”消极数字实践行为来规避表层信息压力。二是自我表达与身份构建的创造性实践。儿童通过自我呈现的技术化符号实践,在“好友圈”等半公开场域选择性分享信息,甚至通过同伴间的“暗语”等交流策略进行隐私保护。然而,儿童电话手表社交的“能动性”本质上是一种“受限的能动性”。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技术逻辑与儿童主体性之间的冲突。品牌生态系统的封闭性制造了数字区隔,不同品牌间电话手表的产品设计逻辑本质上是商业利益对儿童社交生态的侵蚀,即厂商通过技术垄断绑定用户,儿童的选择自由被压缩为“品牌功能”与“社交准入”的被迫选择题。第二,家长监护权与自主权的博弈。电话手表通过其身体绑定与家长监管的双重机制,延续了传统监护关系中的权力结构,家长通过软件禁用、限制使用时长等数字规训手段强化传统权威,儿童只能在有限的自主数字社交空间内进行更为隐蔽的抵抗实践。这一发现进一步呼应了技术中介化的理论观点,即技术并非中立工具,而是嵌入了社会关系的“调节者”,其调节效果因用户群体的特殊性而有所不同^[42]。第三,商业驱动与社会责任的失衡。生产商通过游戏化设计增强了儿童使用黏性,却未充分考量儿童心理健康风险,致使攀比焦虑、社交倦怠等媒介异化现象蔓延。这种商业逐利导向将儿童异化为消费主义的追随者,最终可能会导致儿童的本真探索欲与自主决策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剥夺。

[参 考 文 献]

[1]《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上升至1.96亿》, <https://m.bjnews.com.cn/detail/1732195304129678.html>

[2][21][22][24] 葛 莺:《电话手表与儿童社会交往的强化和窄化》,载《少年儿童研究》,2024年第6期。

[3][14][26] 刘 杰 龙 情:《城市家庭中的养育焦虑、数字技术物品与亲职实践》,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11期。

- [4][19] Silverstone, R.. Complicity and Collusion in the Mediation of Everyday life, *New Literary History*, 2002, (4).
- [5] Stoilova, M., Livingstone, S., Mascheroni, G.. *Digital Childhoo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129 – 143.
- [6] Limtrakul, N., Louthrenoo, O., Narkpongphun, A., et al.. Media Use and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Journal of Paediatrics and Child Health*, 2018, (3).
- [7] 王 茜 张丽敏 赵景辉:《家庭媒介生态视角下电子产品使用对幼儿睡眠的影响——基于全国26381个样本的潜在类别分析》,载《学前教育研究》,2021年第12期。
- [8] Altun, D.. Family Ecology as a Context for Children's Executive Function Development: the Home Literacy Environment, Play, and Screen Time, *Child Indicators Research*, 2022, (4).
- [9] 姜 明 赵倍聪:《儿童短视频创作行为动机与传播伦理风险研究》,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 [10] Plowman, L.. Rethinking Context: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Children's Everyday Lives, *Children's Geographies*, 2016, (2).
- [11] De Leeuw, S., Rydin, I.. Migrant Children's Digital Stories: Identity Formation and Self – representation Through Media Produ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17, (4).
- [12] Luo, W., Berson, I. R., Berson, M. J., et al.. Young Chinese Children's Remote Peer Interactions and Social Competence Development During the COVID – 19 Pandemic, *Journal of Research 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2021, (sup1).
- [13] Thomas, A.. Children Online: Learning in a Virtual Community of Practice, *E – Learning and Digital Media*, 2005, (1).
- [15] Jiow, H. J., Lim, S. S., Lin, J.. Level Up! Refreshing Parental Mediation Theory for Our Digital Media Landscape,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7, (3).
- [16] Müller, J., Potzel, K.. Parental Mediation and the Relational Practices of Negotiation and resistance: Insights from a Qualitative Panel Study from Germany, *Journal of Children and Media*, 2024, (4).
- [17] 甘雨梅:《远程媒介化抚育中的“脚手架”、身体及物质性以留守儿童与打工父母的视频通话研究为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3年第1期。
- [18] Aguiar, N. R., Taylor, M.. Children's Concepts of the Social Affordances of a Virtual Dog and a stuffed Dog, *Cognitive Development*, 2015, 34.
- [20][35] 潘忠党:《“玩转我的iPhone,搞掂我的世界!”——探讨新传媒技术应用中的“中介化”和“驯化”》,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 [23][25][27] 张 健 许佳佳:《微屏社交与班级同伴关系:基于小学儿童的社会网络研究》,载《国际公关》,2022年第2期。
- [28] 张冰怡 张冠李:《提供、保护和参与:城市流动儿童数字使用鸿沟的田野调查》,载《少年儿童研究》,2024年第5期。
- [29] 林崇德:《发展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37 – 39页。
- [30] 让·皮亚杰:《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杜一雄 钱心婷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4 – 36页。
- [31][32]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6).
- [33] 喻国明 朱焯枢 等:《网络交往中的弱关系研究:控制模式与路径效能——以陌生人社交APP的考察与探究为例》,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9期。
- [34] 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罗家德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
- [36] 董晨宇 丁依然:《贫媒介,富使用——互联网中介化交往中的情感补偿》,载《新闻与写作》,2018年第9期。
- [37] 金盛华:《社会心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 [38][39] Bourdieu, P..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and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2019, pp. 499 – 525.
- [40] 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 钢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页。
- [41][42] 罗杰·西尔弗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陶庆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 – 25页。

(责任编辑:韩永涛)